

=====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六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三五期（zk1606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第七个死刑的北大学生右派吴思慧	王友琴
【往事非烟】	二校门沉思录	张 比
【劫后反思】	文化大革命沉思录（四）	陈 坡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第七个死刑的北大学生右派吴思慧

• 王友琴 •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〇〇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一九七〇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枪杀。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〇〇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见本刊 zk0709f—编注）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〇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〇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一九七〇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锬，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在二〇〇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 〇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〇〇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比如，二〇〇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女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〇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一九七〇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〇〇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糊涂。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内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后者二〇〇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源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〇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动，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那些历史叙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

## 【往事非烟】

### 二校门沉思录

• 张 比 •

每年四月底的清华校庆日，我都会返校。如果是从西校门进来，就一直往东走；假如是从南校门进来，就直朝北走；若是从东校门进来，就先向北走到主楼，再折向西行。不管怎么走，都会来到我心目中最美好的母校的标志——二校门前。

仰望她的身姿，巍然耸立在鲜花丛中，在蓝天白云、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显得秀美而挺拔刚健，高大而卓然不群。

不同年代毕业的几代校友们在二校门前照相，人群中传来阵阵欢乐的笑声。年轻的校友高声呼喊，脸上放射出青春的光彩。白发苍苍的老校友选择在这里集合，紧握着同学的手，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二校门从1911年诞生，与母校共同走过百年风雨，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从1946年来到清华园，眼见六十多年来二校门的沧桑变幻。如今，已到人生暮年，望着二校门的身影，不禁陷入久久的沉思。

## 一、清华的象征

二校门是第二道学校大门的简称，特指清华大学校园内的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筑，门楣上书刻有“清华园”三个大字。二校门是为清华园内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因此，常被人们认为是清华大学的象征。

清华园，原址为清康熙年间所建的熙春园的一部分。道光年间，熙春园被分成东西两个园子，西边的园子起名为“近春园”；东边的园子仍名为“熙春园”。咸丰登基之后，就将东边的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了。所谓“二校门”最早就是清华园牌坊。华美的汉白玉雕花门楼，洋溢着浓郁的西洋风味。门楣上“清华园”三个大字，由清朝的军机大臣那桐于1911年题写。字体圆润端庄，颇具台阁风韵。

照片中的那桐，一副颀颀的满族高官的神态，体态脑满肠肥，似乎不学无术的样子。其实，他是清末满族“三才子”之一。我读过有关他的史料，把他的为人概括为贪婪、有才、善变六个字。近年来出版的《那桐日记》，记录了他在清末民初官场的经历和见闻。这里只说说为什么由他题字。当时（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内阁，任他为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奕劻不学无术，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字也写得好，但是汉族，为皇家花园题字不妥。而那桐地位高，名声大，字又写得好，由他来题字自然是最合适的了。说到贪婪，那桐曾负责监修某项工程，与他共事的同僚对公然收受贿赂尚有顾忌，那桐竟反加嘲讽，自称“你是个大姑娘，贞节要紧，我则早非完璧，不在乎此矣！”今日的贪官们，若知道自已的前辈有这样的贪腐哲学，当引以为同调。不过，人品低劣，其书法确实不错，不必因人废字。

1909年清政府将清华园拨做游美肄业馆（1911年开学时更名为清华学堂）馆址。1909年10月游美学务处动工兴建校舍。首先修筑围墙和校门，修建围墙共六百五十二丈（含修补原有六十余丈未倒之墙），“原砌墙高至顶一丈，厚均二尺，下宽上窄”，修筑费用“合银7172两”。至1911年初，随着围墙的合拢，校门随之建成，此时校园面积450余亩。原来，在二校门附近曾有过一座宫殿式的建筑，有大殿一座名“永恩寺”，为园主的家庙。建校时决定将大殿拆除，并由游美学务处发给寺庙主持僧人恤银，将他们遣往他处。现在，尚有两株钻天的古柏和甬路东侧草坪上用水泥板块覆盖着的那口古井，即永恩寺遗物。校门的原负责施工者为斐士（E. S. Fischer）。梁实秋（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曾对早年校门姿貌做过描述：

“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无论远望还是近观，校门造型精美、线条流畅，外形挺拔清丽又不失巍峨庄重，在背后两棵古柏的俯抚下更显得美丽。

这座牌坊早年是清华学堂的校门。也就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怎么就成了“二校门”了呢？原来，因1933年至1934年间校园扩建，先后有了新的大门——西校门和南校门，由外到里，到这里是第二道门，这座最早的校门就被称之为“二校门”了。尽管排行第二，她实际上还是老大。因为，从建筑功能上看，她虽不能像南门、西门（以及后来的东门和北门那样）把校内外分隔开来，由门卫检查来往人员车辆，起到门户的作用，只是在校内部分割了教学区和南部生活区；但从文化功能上看，她不仅是早期的校门，而且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物，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又造型独特，有特殊的艺术形象，故深受校内外人士的喜爱。

## 二、二校门内外

二校门内，是早期清华主校区，分布着最重要的建筑群。

大草坪东南方即是著名的清华学堂，一幢样式别致的二层楼房，青砖红瓦，坡顶陡起，属德国古典风格，是建校初期兴建的首批校舍主体建筑。“清华学堂”题字同出于那桐之手。

草坪南端茵茵鲜绿中有一类似钟的石建筑直立正中，原来是古典计时器，称日晷。上部是日晷的造型，底座上镌刻有“行胜于言”的铭言的中文及其拉丁文译文，以及建造年月日。日晷原为圆明园遗物，1920届学生毕业时移来献给清华大学。

大草坪北，大礼堂呈现眼前，这座罗马式与希腊式的混合建筑，圆顶铜门，门前四根汉白玉大石柱，粗可两人合抱，高约七米。建筑庄严雄伟，一直被清华师生视为自己坚定、朴实、不屈不挠性格的象征。

大礼堂东北方，是图书馆。始建于1916年4月，建成于1919年3月，是“四大建筑”中最先动工和建成的。因为建成前学校就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图书馆，因而人们就习惯地把这个图书馆叫做“大图书馆”，现在称为“旧馆”。初建时只有东面一翼，中部大厅和西翼是后来（1930—1931年）扩建的。扩建工程的设计者是杨廷宝，他结合地形，把平面布置成L形，内外装修基本一致，使扩建部分与原来的部分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被公认为扩建工程中的杰作之一。

大礼堂西南方，是著名的科学馆。科学馆始建于1917年4月，1919年9月竣工，美国建筑家亨利·墨菲（H. K. Murphy）设计，公顺记（Kung Sung Kee）包工，总面积3550平方米，造价12·4万元，三层建筑最高处17·6米。大门以黄铜建造，门额刻有中文“科学”二字和英文“SCIENCE BULDING”，建筑质地坚固。最初作为理科实验室，拥有大小教室、声光热力电物理实验设备、生物设备、化学设备等。此外设有巨型风机为全楼通风。1926年作为新建的物理系系馆，到1931年已有3000余件先进实验仪器。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第一次年会暨成立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二校门外，有河水从西向东缓缓流过，河上有石桥。桥的南面，就是照澜院了。照澜院原名“南院”。后来有了新南院（后称新林院），1934年后改称旧南院。1946年抗战胜利清华大学复校，朱自清教授提议将“旧南院”按谐音改称文雅的“照澜院”，照澜院由此得名。照澜院始建于1921年，当时由10所西式丹顶洋房和10所中式四合院组成，是清华大学早期的教授住宅群。

在照澜院居住过的都有哪些教授学者呢？

照澜院1号——赵元任故居。

照澜院2号——陈寅恪故居。

照澜院3号——赵忠尧故居。

照澜院4号——张光斗故居。

照澜院5号——梅贻琦故居。

照澜院6号——马约翰故居。

照澜院7号——张子高故居。

照澜院8号——俞平伯故居。

照澜院9号——张申府故居。

照澜院10号——袁复礼故居。  
照澜院13号——钱伟长故居。  
照澜院16号——王国维故居。  
照澜院17号——冯友兰故居。  
照澜院18号——朱自清故居。

遥想当年，这些大师们或长袍马褂，或西服革履，来往于二校门内外，引得多少青年学子的仰慕追随。余生也晚，除少数外，多未能一睹丰采。钱伟长住的照澜院13号，就在离二校门很近的马路边。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引得许多师生驻足观看，成为二校门外一景。

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在清华度过了儿童和少年时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王元化先生晚年的著述，常常在文末注明“写于清园”。在其出版著作内封的作者像左下角，常题“清园王元化”。“清园”者，清华园也。华东师大出版了《清园先生王元化纪念文集》，后辈们称他为“清园先生”。近读王元化先生《重返清华园日记》，为他在20世纪末寻觅近七十年的旧踪未果而惋惜。他住过的旧居其实就是旧南院12号，30年代初他家搬到北京城里。他误记为14号，这就难怪没有找到了。

我自1946年（1周岁）来到清华后，住在更南边的普吉院（清华附小东）。1949—1951年上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在丙所），每天从二校门走过。那时的二校门东西两侧还连着围墙。校门的西侧是校卫队，东侧是邮局。50年代后期，围墙被拆除，二校门就更加不像校门，而成为一座具有象征性的建筑景观了。

### 三、惯看秋月春风

从1911年到1966年，二校门静静地站在那里，见证着历史风云变幻。

她看到了一群群学子走出校门赴美留学，又走进校门，怀抱科学与民主的信念，成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拓者。看到了国学院四大导师的风采和四大才子的豪情。

她看到了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学生的救国激情和勇敢行动，看到了校长和教授把学生藏在自己家里，躲过了军警的搜捕。

她看到了教授治校的民主风气，看到了三位被驱校长（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的无奈与狼狈。

她看到了日寇抢占校园的野蛮和血腥，听到了校园里一草一木的哭泣。

她看到了1948年底，清华成了“小解放区”，听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看到了朱自清教授的贫病而死和浦江清教授写在日记里的忐忑不安。又看到梅贻琦校长离校南下的仓促与无奈，陈寅恪和杨武之教授的犹豫与恋恋不舍。

她看到军管会成员走进校门，看到吴晗教授从解放区返回清华与钱俊瑞等一起接管时颇为得意的表情。她听到大礼堂和同方部里潘光旦等教授“洗澡下楼”时多次检讨的发言。她仿佛也听到叶企孙教授低声地说：当年国民党上台时张道藩他们也是这样，好像年轻有为的样子，可后来会怎么样呢？

她看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一批清华人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校门。年底，那位17年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中文系学生，以39岁的年龄就任校长，踌躇满志地走进工字厅，住进新林院。她看到身高体胖的苏联专家走了进来，又走了出去。

她看到清华变成了工科院校，经过扎实的基础课和工程实践训练，完成了真刀真枪毕业的毕业生满怀豪情走出校门，奔赴祖国各地。

她看到，刘仙洲、张维、梁思成等教授“光荣入党”。也看到钱伟长、孟昭英等教授和袁永熙、俞时模、郭道晖等党员干部被打成右派，神色黯然地接受处分。从此清华成了“不漏气的发动机”。

她唯独没有想到，自己挺拔的身躯即将在一场暴风雨中被摧毁，不复存在。

#### 四、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德语：Reichskristallnacht，其实此处中文乃误译，德语“Kristall”此处指的是被纳粹敲碎的橱窗玻璃，和“水晶”完全无关），或译为“碎玻璃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许多犹太商店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的发光，这就是该事件名称的由来。

28年后的1966年，清华大学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等12个中学的红卫兵，在8月24日傍晚，拉倒了象征清华大学的二校门，破碎的石块在灯光的照射下并未发光，而是粉尘飞扬，一片狼藉。

我永远忘不了这恐怖血腥的一夜。

下午，以贺鹏飞等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又称八九派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们高喊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在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战歌”声中，撕毁了校园里的大字报。工物系、水利系等系的八九派红卫兵也参加了行动。从校园里回到宿舍的同学说，水利系的马某穿着军服，手挥皮带，好不威风。

大约晚8点半，天色已黑。我从大礼堂前草坪的东侧向二校门走去。路上，看到几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着一位胖胖的中年男子，让他自报姓名，他不停地说着“我是黑帮分子解沛基”（力学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在清华学堂（土建系）门口，又有几名红卫兵押解着一名瘦高的教师，身上挂着的牌子上写“保皇派黄报青”。那就是坚持“清华党委和蒋校长是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土建系党总支委员，写得一手好字的业务尖子。多年以后，知道他已经愤然离世，我眼前仍然浮现着那天他那倔强的神情和瘦弱的身影。

已经轰然倒下的二校门，变成了一片废墟。看到几位认识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正在殴打和驱赶着一群“黑帮”（清华大学部分领导干部）。刘冰、何东昌、艾知生、胡健等或跪或爬，吃力地搬运石块，汗水和血水从他们的脸上和脊背上流下。几天前，这些红卫兵曾经不遗余力地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辱骂“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同学，现在，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笑容，眉宇间透出杀机。

胆小的我慌不择路，落荒而逃。

在“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声和“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呐喊声中，我绕路回到西院家里。

家里同样一片狼藉。抄家的人刚刚离去。父亲被剃成“阴阳头”，妹妹正在用推子给父亲理成光头。母亲清理着地上的碎纸和被摔碎的花瓶。她告诉我，抄家的是图书馆的“八九派”和邻居里的中学生（此中学生是一顽皮少年，主动带路抄了好多家）。父亲1936年毕业于清华中文系。他曾经写过诗文，吟咏清华园的景色。如今，他的老师——写过《荷塘月色》的朱自清先生赠给他的墨迹——录陆游的《书愤》诗，已被抄走。朱先生的笔下，荷花池是那样的幽美静谧，而如今坐落荷花池西岸的西院，却被施暴者搅得鸡犬不宁。

被抄走的还有《李太白全集》、《杜少陵全集》等上百部旧版书和祖上遗留的几件文物。当夜，我们全家未睡，听着外面传来一阵阵叫喊声。邻居的几位“右派”教师和“有历史问题”的职工都被抄被打。另一住宅区的家属，有地主分子或“地主婆”身份的，有被打伤甚至打死的。

第二天，我回到宿舍，听说我班的清华红卫兵也去家属区抄家打人，有的人还拿走了老教授的存折。看到他得意洋洋的样子，我却不寒而栗。红色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家属区，也笼罩着学生宿舍区，笼罩着整个清华园。

那几天，清华被抄家的有多少户？被打的有多少人？死伤的有多少？被抄的财物价值多少，后来哪里去了？还未见有人做过统计并公布。[80年代，清华党委统战部主管“落实政策”的工作人员说，现金和存折是不见了，能够找到的抄家物品大多返还了，只有钱伟长的集邮册（有大量珍贵的外国邮票）和你家的几件文物下落不明，也无法估价。钱家和你家都不同意象征性的赔偿，坚持要原物，中央要求13大前解决，我们也无能为力。]

以推倒二校门为标志的毁灭清华文化、迫害清华师生的暴行，是北京城乡的“红八月”恐怖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前后，中学红卫兵向他们的校长老师，以及北京城里无辜的市民动手，共杀害1000多人。几天以后，听不久前在大兴庞各庄参加“四清”的弟弟说，大兴发生了极端残忍的屠杀地富及其子女的事件，有的打死，有的是活埋的。（后来得知，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在文革初期，“红二代”们为保住自己父辈的政治地位，拼命把矛头引向更弱的弱势群体，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打人杀人，这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思想体系一脉相承。不管怎样，在文革中，高层的发动者和反对者的斗争最终还是内部之争，对人为制造的“黑五类”——阶级敌人，他们的歧视、仇视乃至残酷地从肉体上消灭，方向是一致的。

“8·24事件”是“破四旧”、“红八月”的高潮。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暴力，情绪非常狂热，行动极为残忍。“红卫兵”这个名称，和纳粹的“党卫军”是否有什么不同？也许不同之处仅在于，“党卫军”打击的是几百万犹太人，“红卫兵”打击的是上亿的“黑五类”（后来扩大到“黑七类”）及其家属，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其余则沦为“政治贱民”。他们最直接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2011年，原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在《心灵史》前言中说：“若说那场革命有什么罪恶——那么以血统的借口对他人实行歧视的行为，是文化革命中的最大罪恶”。但他在日本用日文出版了《红卫兵史》，却拒绝在中国用中文出版。几十年来，除了极少数有勇气和良心的人，原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中，竟没有人公开对此事表示忏悔。



不幸的是，清华大学红卫兵开了暴力的先河，后来的井冈山红卫兵及从中分化出来的派别，竟然继承了他们暴力习惯，打人、抄家的行动变本加厉，发展到把清华园变成了武斗的战场。两派都没有摆脱“血统论”的影响，对反对自己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或者自称是温和派），无一不是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无不具有暴力的倾向。

8月24日夜晩，倒下的不仅仅是老二校门，而是老清华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是老清华的人文精神与优秀校风、学风，是美好的文明与善良的人性。

二校门被摧毁了，她不会说话。而在有良知的清华人的心上，却留下了永远的痛。他们会记住8月24日那个夜晚，如同德国人会记住那个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

## 五、领袖塑像的树立和倡议者的倒下

1966年8月24日，二校门消失，原来的位置空空荡荡。土建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程国英讲师在一次会上提出，这样空下去不好，应当建一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

程国英肯定是从对伟大领袖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尊崇心理出发的，但作为一位美术老师，他的建筑美学修养无疑也是不错的，这一提议从政治到艺术无懈可击。于是，无论是具有美术水平和设计能力的土建系教师，还是最最忠于伟大领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都欣然采纳，积极支持，付诸实施。关于主席塑像的建造过程，已有其他作者撰文记述，这里不再多说。但是，首倡者程国英的命运后来如何了呢？

程国英，别名程果，黑龙江哈尔滨人。擅长油画、水彩画。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任清华大学土建系教师。作品有《南京古鸡鸣寺》、《井冈山风暴》、《土地革命时的赤卫队》等。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程国英家住在西院20号，与我家住的18号很近。因为有小学同学向他学画，我随同学去过他家。他身材高大，有络腮胡子，颇有东北汉子气质。他表情严肃而为人随和，但话不多。而他的夫人胡建新女士（校医院护士）则为人热情，特爱说话。我随同学称他们夫妇“程先生”、“胡阿姨”。程先生的画技法纯熟，色彩浓重，布局大气。提议建主席塑像的他，一年多后，为什么死了呢？1968年11月，我还没有离校。听胡女士对别人说，在东北老家时，20多岁的程先生被国民党县党部要求画一幅“蒋委员长戎装像”。这就成了程的不可抹去的污点。工宣队进校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要求有历史问题的人“竹筒倒豆子”。动力系、水利系、基础课、体育教研室都有教师自杀。土建系的程先生在压力之下，也走上了不归路。从画蒋介石像到倡议建毛泽东塑像，画家竟然摆脱不了政治的捉弄。尽管1949年后他精心绘出革命题材的油画，受到美术界好评，也赎不了历史上的“罪行”。现在艺术类网站上还在征集程国英的作品以便拍卖，在美术圈子里，大概他的名字为不少人所知。如果还活着，我想，他应当成为一位大画家了吧。

程国英死了，他的夫人胡女士仍然坚强地活着。以她低微的地位和微薄的工资，养育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中学毕业的清华子女绝大多数到贫瘠的地区下乡。她见人就哭诉，赢得清华园内许多人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成天往海淀区知青办跑，在那里扫地擦桌子，诉说她的不幸，感动了那里的工作人员，居然批准让她的孩子都回城了。儿子程远后来留学美国，成为知名画家，并回清华建筑系任教。2008年前后，我在清华食堂经常看到他们母子在那里对酌，还邀请我入座。我虽然谢绝了，但与胡阿姨聊了好几次。我看过程远画作，似乎天赋比乃父略逊一筹。不过，他乐观豪放，酷似其母。性格即命运，也许有些道理。

程国英死了，事情还没有完。离塑像最近的清华学堂里，土建系的教师们继续挨整。同样有美术才能的教师的画都被打成黑画，参加过红教联的教师受到追查，被刘少奇说成“和他老子一样反动”的系主任梁思成继续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1972年黯然离世。黄报青不幸身亡。程国英死后一个月，被认为土建系最有才华的讲师程应铨于12月13日，在荷花池南边土坡旁的游泳池投水自尽。程应铨1957被划为“右派”，妻子林洙与他离婚，后改嫁梁思成。1926年的4月和8月，军阀在北京城里杀害了著名报人林白水 and 邵飘萍，被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1968年，在清华荷花池南边发生了“二程相逢一月间”。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凄惨的命运何其相似！

程国英死了，高大的塑像仍然屹立。在1968年春夏，塑像——伟大领袖的替身，看到了号称对自己最忠最忠的两派同室操戈，大打出手。他听到子弹呼啸着飞过身边。他也听到离他很近的第一教室楼的前哨广播站充满火药味的声音和不远的科学馆里发出的被称为“完蛋歌”的414战歌。

他看到工宣队进校，送来金黄的芒果，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他看到老5届毕业生仓皇离校，临行前在他的脚下摄影留念，并向他表示忠心。

他看到那位8341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和那位女机要员在这里气焰嚣张地统治了8年，创造了荒谬的“经验”，组织“梁效”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继续革命”的奇文。

他看到工农兵学员意气风发地走进清华园，实行“上、管、改”。在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一群群外单位的人络绎不绝地来这里“取经”。

他坚毅地挥动着写出过“为民立极”的四卷雄文的巨手，似乎看到了包括清华师生在内的亿万民众，高呼着“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口号，沿着不知有多远的革命道路，向着虚无缥缈的目标前进。

他看到清华的师生中有多少人致死、致残、致病，有多少人近似疯狂地内斗，有多少人荒废学业，虚度年华，多少人奔赴田野山林，苦撑岁月。他似乎认为“成绩最大最大，代价最小最小”，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有没有想到，在诸多英才倒下之后，他自己也会轰然倒下？

## 六、具象与抽象

“文革”结束以后，在清华大学广大教职工和海外校友的要求下，学校领导决定恢复清华园牌楼。在清华校友的捐助下，

清华园牌楼于1991年在原址恢复了原貌。

由于没有准确的原建筑图，现在的“二校门”是根据照片复原而成。1990年1月31日，26个清华大学各地校友会发出了一份《关于赞助重建二校门的倡议》，提议由校友捐款，在原址重建。

新的二校门重新出现在原有地址，门前又成了众多校友驻足的地方，并引来无数外来参观者瞻仰。

新二校门和老二校门外表同样秀美华瞻，英姿挺拔。中西合璧的结构，雅致清丽的色彩，与周围的景观协调一致，相得益彰。她给人以视觉的美感和强烈的冲击力，蕴含深刻的文化内涵。外形和色彩，是她的具象。校内外人士都对她有难忘的印象并产生美感。这一点，新老二校门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按照美学观点来看，二校门是审美的客体，观察二校门的人是审美的主体。对于同一个客体，不同的审美主体由于不同的审美偏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读。也就是说，具象背后，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抽象。在我心目中，老二校门是朴素的，厚重的，生气勃勃，顶天立地，象征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新二校门和老二校门外形和色彩上没有差异，如果想象成老二校门没有被毁，遗留至今，也未尝不可。不少老校友可能就是这样看待的。而新一代的清华学子，面对新的二校门，可能只看到了美观大方、与众不同的外表，迷恋她的高大俊美，在新的时代里，追求事业的成功和个人的发展，甚至以成为高官或巨贾为骄傲，似乎这也是一种抽象。试看百年校庆时《新清华》特刊中杰出校友的排位，就可说明这一看法并非虚言。

而存在了8年的领袖塑像，外形设计和细部制作在艺术上都相当成功。领袖的神情庄严而亲切，坚定而自然的挥手姿态，也稳重而威严。细看，则蔑视群雄，放眼世界，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雄踞天下的霸气。今天，有的人仍然怀念那个时代，仍然喜欢唱《东方红》和《太阳最红》，依然从政治到哲学到文学到书法都对雄才大略的曾被誉为“四个伟大”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五体投地。但更多的人则可能从“与人斗其乐无穷”中看出了对人性的敌视，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看到了过度的野心，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看到了反智主义，从清华的文革10年中看到了“继续革命”的激进理论的荒谬和实践的残酷，不愿在任何人的挥手指引下盲目地“前进”了。

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浸淫于自己的专业，对这种“政治化”的话语已经不再关心。对于“二校门”的历史风波，无论是当时的造反者还是当时的被批斗者，都有不少人曾经婉拒记者的访问，称“年纪大了”，“不想再说过去的事情”……

不少经历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选择了埋葬这段记忆。

我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几乎每年都要到新的二校门前摄影留念，大家似乎没有在意新老校门有什么不同。

从1991年到2007年，我曾经多次陪同父亲的同级（1936）同学于光远、王大珩、何泽慧、严仁英、荣高棠、黄蕙、许孝慰、谢毓章、夏震寰、陈明绍、鲍熙年、罗青、杜秉正、胡家驹、张肖虎、邝壁城等前辈，从甲所走到新二校门前，停留多时。如今，前辈们大多已经作古。我以为，前辈们的心中，想的还是老的二校门。

2005年那次聚会，年逾90岁的前辈们还齐唱了清华校歌。

一位校友在个人博客中说：“老‘二校门’、毛主席塑像再到新‘二校门’，把清华和清华人分成了三个时代。”

你心中的二校门，是哪一个？

（作者简介：张比，男，1945年生于河北唐山。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分配到水电部一局，后在吉林市科技局、华北科技学院等工作。）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劫后反思】

文化大革命沉思录（四）

• 陈 坡 •

（续 zk1606a）

◇ 之六十七

毛是终生的反孔派。以斗争为生命。文革中宣称两个决裂，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早在66年底，毛讲过文革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清除孔儒的影响。秦始皇也是毛心仪的历史人物。“秦皇汉武”。但林彪事件深深刺激了毛，因为林家父子诅咒毛为当代秦始皇，令毛耿耿于怀。73年毛给郭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抒发了这种郁闷的情绪。而林彪是崇文王的。毛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贼一样。因此，发动批孔运动，是批古人死人以警示活人，如张江姚所暗示的现代的儒，党内大儒。74年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谢静宜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矛头所指是人所尽知的。江批评周对批孔“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对批孔的真实想法，周曾对其侄说：“对孔孟之道还是要进行全面地合理地科学地研究分析”。江还利用批林批孔不断染指军队。显然，毛亲自发动和领导批孔运动是为了防范周对文革“右倾翻案”。影射史学是这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独特特征。“周公”成了周恩来的暗喻。另外，权衡利弊，毛重新启用邓也是制周甚至代周。

◇ 之六十八

维护文革的历史地位与收拾文革的动荡混乱是毛垂暮之年政治上的指导方针。这是毛最后的战争。邓二次出山是毛的一步险棋。毛一直保留邓这个棋子以观后效。72年8月，毛在邓信上的批语主要讲邓在中共建政前的功劳。对于中共建政后，毛只讲邓“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据相关学者研究，49年之后，特别是56—61年，毛邓有一段非常密切的合作时期，被评为“谋事在毛，成事在邓”。56年八大以后，邓以总书记主持党政军日常事务，号令八方。毛在59年确实讲过，他是正帅，邓是副帅，“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以至贺龙问朱，少奇怎么摆？只是62年大饥荒以后，毛邓政见有异，渐行渐远，毛讲邓总躲着他，“敬鬼神而远之”。文革时毛几次讲邓是刘司令部中摇鹅羽毛扇的军师。应该说，大饥荒与谪居江西的两个三年是邓反省左祸的两个关键性觉悟时期。九大以后政局的诡异突变，远放江西的邓又有了出头的机遇。73年3月，邓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列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将如慧星流过，轮到“党内二号走资派”登场了。

◇ 之六十九

毛对邓的任用与考察近两年，从73年3月邓孤独地现身于国务院招待西哈努克的宴会，其国内的落寞与海外的轰动意味深长，到因周遭遇十一月寒流而崛起于政坛，才为邓的施政结束了预备期。周被毛视为老右，林倒后，毛的目光聚焦于周，而周在政坛的地位与影响无与伦比，海内外瞩目，一人之下，亿众景仰。74年国庆招待会，周短短祝酒词被十余次掌声打断，人心向周而非毛。江张姚的前哨骚扰接连不断，而终于在周与临时的基辛格会谈军事合作问题未及时请示毛而决定继续交换意见的所谓外交失误上引发惊涛骇浪，毛严厉指控周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苏联打过来要当儿皇帝，11月21日到12月上旬，政治局会议连续批判周叶的右倾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周奉旨主持自己的批判会，江指责周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取代毛。周对江申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政治局会开成了对周的批斗会。这是74年江青策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及“揪现代大儒”的政治背景。邓冷静观察，体悟圣心，会议结束前对周警示：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话不多而言重。毛知后随即决定邓进政治局、军委，任总参谋长。称“请了一个军师”。

◇ 之七十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邓顺应当时民众厌乱望治的普遍心理，以举重若轻的强势作派开始了清理文革的全面整顿，被杨小凯称为英国革命蒙克将军的复辟。邓不是周，是急性子，且在南昌效野的小路上走了三年，沉思了三年，不说急不可待，亦是跃跃欲试。邓出山是一个标志，老干部越来越多恢复原职，还乡团回来了。毛把二月逆流以及贺龙杨余傅罗瑞卿等案的责任统统推给死无对证的林彪，高层的政治气氛大大和缓，为了支持邓放胆工作，毛建议邓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批评上海帮、四人帮，并称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4月，邓在联大上发言：“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就应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0月，江张等籍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崇洋媚外”，邓在政治局会议上以理力争，江大吵大闹，邓拂袖而去。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决定周与王共同负责，并建议邓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12月，毛又决定邓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羽毛丰满。75年将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一年，正是这一年的作为与成绩及由此享有的声望，为改革开放时期邓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 之七十一

批孔的一段插曲冯友兰《论孔丘》发表后，梁漱溟在政f学习组对批孔运动始终保持沉默。他对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不以为然。政f的同事们劝告梁向冯氏学习，公开发表意见支持批孔，梁说，冯文讲得未必是真话。梁被围攻，要求他对当前批孔运动明确立场，端正态度。梁说，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主持会议的人要梁讲讲，长短不限。74年2月22日，八十一岁的梁登台开讲：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梁氏的讲演在当时只是鸡同鸭讲，只能招致一阵疯狂的大批判。面对轮番的批判质问，梁氏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最后的儒家——梁氏的独立思考与自由思想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 之七十二

74年11月，受毛委托，邓为病重的周主持起草了最简洁的在四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控制在五千字以内，主旨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经过文革八年的折腾，经过周邓务实派的顽强努力，又回到国家的正式议程，成为主导中国未来四十余年的奋斗目标。这是举国举世注目的大事。75年1月，周以病弱之躯念了开头的这个报告转瞬间为迷乱动荡的国人开了一扇面向未来的窗口。然而，四届人大的现代化，仍限于工业、经济与技术的现代化，这个目标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努力，已基本实现了。而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法治、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本应成为未来中国三十年的奋斗目标，以成就四化的初衷乃至中国仁人志士百年来的梦想，这是现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真实利益与渴望，也是现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执政党却有把这样的目标——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希望作为国家的议程、国家发展的方向，凝聚中国民众的共识，以制度变革的智慧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与失误，让人权的普世价值照彻通向世界文明的正途。

◇ 之七十三

四届人大甫过，周宣布邓主持国务院工作。早在73年4月，周在玉泉山与邓长谈，通报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查。邓与周就达成了政治默契。5月，邓主持中央工作。邓接手的中国政局，问题成堆，吃饭仍是很大的问题，鱼米之乡的浙江，要从北方省份运地瓜干、小麦救灾，运输的火车车厢上写着白漆狂草“给浙江懒汉吃”，金华、温州发生了民兵参与的大规模武斗，伤亡惨重，省委书记谭启龙被绑架。……邓的全面整顿先从军队开刀。文革把中国折腾成军政，军队膨胀，从59到71年，军队总人数增加360万，74年时，军队干部超编60多万，多为非作战部队的政工闲杂人等。文革派性渗透军队，纪律散漫，训练废弛，有令不行，74年西沙作战时，有擅自把大队长以上干部派去执行临时任务。准备打仗，是邓整顿军队的纲。邓以“肿、散、骄、奢、惰”概括军队痼疾，消肿为首，重点清除派性，并严防中央文革势力控制军权。叶警告，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叶与各军区各军种负责首长以个别谈话的方式，通报毛对上海帮的批评，对任何人不经军委干预部队事务的，有权抵制。75年6、7月军委扩大会议后，组建了叶聂粟陈杨成武梁必业的军委领导小组，决定减少军队定额160万，其中主要削减机关、后勤与陆军，加强海空军与特种兵，保留技术骨干，选配与调整军队的各级主官。

◇ 之七十四

邓力推的全面整顿，集中触动了文革后期国民经济与社会政治积压的各类棘手问题，如体制机制、管理规章、派性、条条块块、军队地方、冤假错案等，在毛坚守文革基本格局与意识形态进攻性的限制下，处理这些尖锐顽症，必然触及文革，难免遇到巨大的干扰与阻力。尽管中共领导阶层劫余所存，千疮百孔，仍在各重要领域有一批有识有胆有能有为且敢于为民先驱的猛将，如铁路交通领域的万里，科技领域的胡耀邦，教育领域的周荣鑫，国防工业领域的张爱萍，财政领域的张劲夫以及国务院研究室的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邓在党政军的主要助手，如叶剑英、谷牧，地方才俊赵紫阳等，没有这些人的鼎力推进与冲锋陷阵，邓小平是孤掌难鸣的。而邓的气势作风，亦可圈可点。如对军队派性，邓讲闹派性的一个不留，万里讲徐州受冤平反者应有七八千人之众，邓讲要借东风一块解决，七八千人，8000人一批，分10批，公开向群众宣布。平反要一批一批地搞。邓籍整党在全国范围内清洗新老造反派及反潮流分子，削弱中央文革势力的干部基础。邓否定了胡乔木政研室吸收一些革命造反派的建议。对邓而言，四化、现代化是大局。三个文件的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为全面

整顿提供了理论根据，既是六十年代初各种条例的承继，又是八十年代改革的先声。1975年，是十年文革中较有生气的一年。

◇ 之七十五

毛在从战术上起用邓治理整顿的同时，从未忘记巩固文革的既定方针。毛重用张春桥，从意识形态方面为文革护法。74年底，毛关于专政理论的谈话，就是为文革寻求马列理论的依据，其实质内容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商品制度、工资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构建系统的继续革命理论，建立传之千秋万世的文化道统，也为邓的整顿划一个界限。文革的理论是这一时期形成的。首席理论家是张春桥。张在四届人大上做修改宪法的报告，把五四宪法修改成全面专政的阶级斗争宪法，可取之处是准许罢工自由。随后，张被毛任用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因与江青冲突被贬为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如愿以偿介入军委领导核心层。75年2月，毛决定印发张姚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二十三条。4月，张春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称文革的实践证实了文革的理论。张春桥称：“一个官僚资本或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张强调政治领导权是最根本的，只要有权，所有制想变就变。而文革解决的就是领导权问题。乌有之乡的文化鼓噪不过是张春桥思想的拙劣的复制。

◇ 之七十六

毛的两手政略引起文革派与整顿派的不断冲突。两派难以调和。为癌症所苦的周在垂死之年为邓保驾护航。应该说，是这个时期，也只是在这个时期，周邓的政治命运才牢牢地并为后世永久地连在一起了。75年4—6月张王江姚反经验主义为邓叶周通过毛联手扼制，邓叶还借此对江青严加批评，江做了书面检讨，检讨了四人帮的宗派主义。75年8月，毛评论《水浒传》：“《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谁是投降派？谁是宋江？谁是晁盖？姚将毛的《水浒》评论起草了一份反投降派与投降主义的请示报告，其核心观点为修正主义者都是投降派。毛批发全党，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奇异的政治运动，江青称：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显然是把矛头指向周邓叶的。毛或许有被老战友们孤立之感，自比晁盖，那么宋江一定是周。被谁招安呢？美国吗？周病魔缠身，心地苍凉，对老朋友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9月，周对邓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自知不久于人世，遂亲笔致信毛举荐邓接替他现任职务。此信石沉大海。而毛，越来越难以容忍邓纠正文革的后果，邓亦不妥协，周于是在批邓的压力下，在越剧《黛玉葬花》的忧伤曲调中，绝望地辞别人寰。周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 之七十七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发动的最后一场政治运动，是运动一生的共产袅雄在垂死之年对“资本主义”风车的最后一击。本来是幻影的风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无中生有，越转越大。这是历史的喜剧。证实了超级的权力意志在时代趋势与人性顺逆的伟大力量前面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卑微！75年10月，毛留其侄毛远新做自己与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要小毛帮助江。文革的政治是毛江的政治。反对江青的元老勋臣在毛手下迟早都受到残酷的斗争与无情的打击，只有周体悟这个政治秘密。周曾告诫邱会作“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林副主席死了，中央政治就只有毛与江了。细细品味毛对江的多次批评，关爱之情绵绵不绝。十大会后，毛见吴德等，谆谆教诲他们支持江张王姚，如培育花园

的春苗。小毛与江青心有灵犀相互支持。王海容唐闻生因受康生嘱托调查江青叛徒历史而被毛疏远。章含之为此事向江青的告密令其夫乔冠华晚岁坎坷郁郁而终。而邓，是又一个钢铁公司，绵里藏针，是从来不把江青看在眼里的。毛曾要江找邓沟通，江邓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邓是不可能辅佐江的。这不符合邓的政治性格。

◇ 之七十八

毛远新进京入中枢随侍核心左右，政局很快逆转。毛从不同渠道包括李先念获知邓在全面整顿中对文革的非议，其中小毛的汇报有不可低估的刺激因素。早在9月27日，小毛向毛反映社会上有股否定文革的风。当毛联络员后的11月2日，小毛对老毛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应该说，小毛的观察并不错，邓确是以四届人大宣告的四个现代化为政治大局与指导方针推进全面整顿的，对文革造成的派性混乱坚决处置，必欲除之而后快，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安定团结与现代化。也正是这种拨乱反正的努力，经济社会局面有了好转。邓的黄金岁月一年有余。但毛，对于文革的任何批评都是高度敏感与高度警觉的。文革是毛的禁地与禁忌。老毛赞成小毛的看法，讲有人要算文革的帐，委托小毛开小会解决邓的文革立场问题，冲突箭在弦上。

◇ 之七十九

批邓肇始于邓两次转送清华刘冰信给毛，刘信反映的是迟谢私人品行的不雅与迟的迷权逐势等不良表现，毛勃然动怒，批评刘信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指责邓偏袒刘冰，并将刘信上纲为“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迟群、谢静宜成了文革的象征。由此引发了所谓大辩论。随后，毛远新奉旨召开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参加的四人会议。小毛对全面整顿加以全面指控。邓力辩九号文件以后的形势应由实践证明好坏。并称“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老毛听小毛汇报后讲，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授令小毛开八人会议讨论。11月，小毛召开邓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人会议，讨论文革认识问题。张指责邓与刘冰立场一致。毛听汇报后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指令小毛开再扩充人数的小会帮邓。11月20日，毛通过政治局会议要邓主持作一个关于文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决议，邓婉拒并称：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邓关于文革评价的分歧迅猛演变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暴。

◇ 之八十

毛的批邓是一步步推进的，从质问到帮助到批评，有几个月从小到大的扩展，毛远新扮演了毛的代表，对邓施压。由于邓的不认错不服输以至拒作文革决议，毛从怀疑到确信：永不翻案，靠不住啊！邓在毛活着的时候，就已表露了对文革的不满，而且要算帐。这是毛绝对不能容忍的。批邓急速升级，11月24日，毛决定在邓主持的政治局打招呼会上宣布他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清华问题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两天以后，中央将《要点》传达高层乃至全国，正确对待文革的大辩论由清华扩散到全国。12月20日，邓主持政治局会议并做了检讨发言。邓在说明了整治派性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性后，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邓将检讨发言呈毛审阅。1976年1月1日，权威的两报一刊社论公布了毛批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最新指

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大悲大喜的文革尾声伴着不断的哀乐奏响，是文革的丧钟。

◇ 之八十一

1976年初邓的二次检讨坦承，以“三项指示为纲”未请示毛也未经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1月8月，周恩来病逝。邓在周追悼会上致悼词，为他这位五十多年前的留法兄长而于垂暮之年结为政治死盟的战友哽咽挥泪而永别。随后，毛决定华国锋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2月2日毛又决定华任代总理，陈锡联主持军委，叶靠边站。稍后，批邓在党内公开。并公布了小毛整理的毛批邓讲话，择要如下：邓“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比较毛对刘、林、邓、周与对江张王姚的批评，轻重立见，对前者，不是一般的批评，而是立场、原则与敌对的指控，是宣布罪状，其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卖国贼、投降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扣帽子、打棍子，小题大作，而对后者，是善意的提醒，同志式的告诫，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大题小作。毛把王明批他的政治帽子全部且添油加醋扣在了刘林周邓头上。而且方法也是如法炮制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4月4日，迟群等列席政治局会议，批邓“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为了在文革派与整顿派中平衡，毛决定“政治水平不高”却谨慎忠厚的华接替邓，同时托小毛安抚张，自己曾任十年副手。毛没有忘记庐山会议的震荡。华总理上场了。

◇ 之八十二

就在批邓从清华园扩散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时，地下的异议汇成群众性抗议，从对当局限制周恩来悼念活动及官媒《文汇报》含沙射影批周的蛮行中触发，高高在上的肉食者无视民众的意愿而独断独行，人民则不再愚不可及，沉寂突然被打破，“扬眉剑出鞘”，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面对自发的、天然的、无计划无操纵的反抗运动，从3月初南京大学生与市民首义雨花台追悼周声讨江张开始，终于天安门抗议群众被镇压，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周恩来变成反抗秦皇暴政的旗帜，矛头明白无误指向江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压抑九年的怒火如火山爆发，突然席卷了从南京到北京的中心地带，十里长街伫立着近百万哭送总理的各界民众，以感天动地的哀泣表达对文革的愤怒，愤怒出诗人，诗歌如雪片纷飞，志士奔走相告，天安门上的花圈与火焰是人心与时代的象征，73年与75年的党内抗争获得了数百万南北民众的响应。深居宫中的病夫感觉无限的沉郁与失落，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首都，天安门，这是算我二十七年的帐。胡乔木说，毛闭目塞听，没有几个人同他来往。运动群众的祖师被群众运动了，这位奋斗一生的红太阳终于品尝到了日落时分被全民批斗的凄楚滋味。无以计数的死魂与冤魄齐集中南海，向苍天厚土呼唤正义的报应。

◇ 之八十三

文化大革命的土地，沉积着一层又一层的冤气、怨气与怒气，不仅仅是贫困，不仅仅是命运的无常或个人的无奈，而是别无选择，绝望，从被压在最底层的贱民——地富反坏右，二元体制下被剥夺了一切福利保障和权利的农民，被知青困扰的千万城市家庭，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被下放的党政军干部与被改造被羞辱的知识分子，到领袖核心层一批批从天堂摔落地狱的亲密战友们，文革十年，坏分子知多少？帽子知多少？一轮又一轮的百分之五，累计成庞大的数字，画成一个天大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伟大领袖永远是正确的？革命究竟为了什么？荒诞的是，要不要生产都成了堂皇庙堂讨论的问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如果卫星上天必然红旗落地，要红旗干嘛？“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难道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只因人口太多了？从怀疑一切，到怀疑一个人，一个神，越来越多的人在心底里默诵着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春秋故事。无数的疑问，无穷的苦闷，对前途的绝望，忧己忧家忧民忧国，空洞的意识形态已无任何感召力，而清明时分的天安门事件是这种怀疑、怒气与怨气的总爆发。

◇ 之八十四

周的灵魂萦绕神州。死者纠缠着垂死者。毛圈阅毛远新关于天安门悼念与抗议活动的情况汇报，其中有天安门抗议者“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清场。4月7日，毛听取毛远新天安门镇压的情况汇报，颤抖地写下“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的歪歪斜斜的纸条，连喊“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向全国公布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真相。并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决定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接着，是各地党政军首脑表态，游行，庆祝。纵观輿情，轰轰烈烈的表面是强颜欢笑与惨淡的心情，再也没有文革初期造反有理的狂热兴奋，生活的磨难与希望的幻灭早使人们沉入一个个迷茫的岁月。度日如年。4月30日，毛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无奈地叹息“天下大乱”。再后，是追查谣言，特别是一本流传甚广的《红都女皇》的小册子……7月28日，一场唐山大地震摇撼了中国，30万生灵归还地府。年初（4月）的陨石雨与此前毛生日长寿面的断碎，预示着更大的变局。中国人真的酷似《共产主义宣言》的无产者，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 之八十五

毛对邓“猫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又一次把论争引到大饥荒时代的62年，或许这一年是毛邓政策裂痕的关键年份，56年以后的反右、反军队教条主义与反修，邓都是毛的秘书长，是副帅，是几个组的组长，是毛的心腹股肱，为毛立下汗马功绩，而面对千万人啼饥哀号的大饥荒，从四川大量调粮而致川民辗转沟壑尸填山野的惨象，邓被震动了，意识形态的僵化教条动摇了。邓、陈未参加59年的庐山会议。对于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打成的成千上万右倾分子，邓主持的平反一风吹了，被毛后来批评为“翻案风”。邓毛的隔膜再难愈合。当然，彭德怀骂皇帝的冤案谁也不敢翻。62年7月，邓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如何恢复农村经济时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不久又在见共青团全会的委员时讲，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猫论传播甚广，形同现代俗谚，只是在流传中“黄猫”传成“白猫”，而毛，死死记住了邓的不改的“黑猫”。

◇ 之八十六

批邓的纲领，是毛远新整理的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的多次讲话，1976年3月作为中央4号文件发布，题为《毛主席重要指示》。准确地说，这是毛的最后指示，应看作毛的政治遗嘱。毛的这些讲话的全部要旨是对文革的理论做总结，为文革的正当性盖棺论定。毛说：阶级斗争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 之八十七

毛最后一次挂帅出征的批邓讲话，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讲道，更似与被禁闭的老战友们争辩，与副帅邓小平争辩，也未忘以哲学家的气势为其操纵的文革理论提供“辩证根据”：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毛信口开河的百千万年革命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干了。毛已无九大对文革的咄咄宏论，而是放下了身段调低了嗓门：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承认文革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毛对老同志与造反派各有告戒，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毛讲批邓运动在党委领导下开展，“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最后，毛以导师的身份劝其臣属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 之八十八

对比毛的最后指示与邓的南巡谈话，毛远新讲毛邓治国理念之不同是确实的。但毛邓在党专政方面是高度一致的，毛誓死捍卫文革，邓临终坚守四个坚持，差别在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邓是唯生产力论，邓有现代化目标，毛没有，毛的革命是无穷无尽的。毛邓的分歧是党治下的纲目之别。76年批邓时，尼克松拜会了毛，后来回忆说：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最后的几个月，6月25日，毛同华谈话时写了“国内问题要注意”最后七个字。差不多同时，毛对华王张汪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讲话中还有毛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得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垂死之年，毛似乎预感了什么，他又调出并重温延安时期批王周的“九篇文章”。他梦归故土，思归故土，却不可能。他常常同张玉凤孟锦云看港台电影，讨论《红与黑》。7月，毛虚弱地吟诵了庾信的《枯树赋》：昔日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8月，江青悲叹：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9月9日，弥留之际，毛自语，我不行了，快完了。韶山的太阳终于下山了。江青“悲痛之状，催人泪下”。江才是毛的亲密战友而非亲密伴侣。青年时代的毛写道：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人没有万寿无疆¹

◇ 之八十九

历史无法预测。毛死后不到一个月，10月6日，华叶汪调动8341部队逮捕了江张王姚与毛远新。据韩钢的考证，这个行动事先实际上征得了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又如中央对华悼词所言，华在逮捕行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这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还原华国锋”。华汪无法与江青共事，叶更难容忍，在毛造成的你死我活的无法无天政治氛围下，江张王姚与小毛沦为政治斗争的阶下囚，也是罪有应得。据说事变前陈云计算过十大中委的立场，以为通过全会无法解决四人帮问题。非毛化是从华叶汪启始的。77年7月，邓恢复职务。78年12月，陈云扮演了特殊角色的三中全会又一次改变了政局，邓陈胡取代了华叶汪，叶的地位虽未变，但逐步隐为幕后的国老。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贡献是彻底终结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政治，转向周恩来梦想的现代化建设。于平反冤假错案中脱颖而出的正直的胡耀邦注定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实践标准”独领风骚。文革，终于结束

了。曾几何时，中共把文革的一切罪恶归于四人帮，外国人总是举起五个手指。谁会忘记始作俑者呢？

◇ 之九十

文革对中共高层的震动太大了，教训太深了，天翻地覆。经济重心的转移引起了拨乱反正的平反浪潮。从元勋国老到地富反坏右，所有受到政治迫害的阶层与个人都要恢复公民的平等权利，都要洗刷几十年政治批判的污泥浊水。否则，人心不平，民心难顺。文革后的执政集团，从华叶汪到邓陈胡，都难以回避国内外与党内外对文革的质疑。从62年七千人大会检讨大跃进进到80年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实际是检讨文革反省文革——是共产党内健康力量良知未泯的不懈努力。崔武年讲历史决议是八十年代邓陈老一代政治领导层对文革的反思与论定，是有见识的。也就是说，文革反思有局限，局限于党国元老。文革是亿万群众参与并受难的政治运动，反思必须是全民的反思。反思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马晓力蔡霞两位女士于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发动的文革反思就是全民反思的一部分，是接着八十年代的老一辈政治家的反思的，那一次的反思开启了经济改革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次的反思能否开创政治改革的宪政议程呢？

◇ 之九十一

八十年代初，四千名高级干部议论文革，是三中全会与理论务虚会讨论的继续。大难刚过，劫后余生，发生了中共历史上少有的较为民主与较清醒的时期。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齐头并进，墙里墙外相互呼应。叶帅坦言，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三中全会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其政治影响是惊人的。受囚禁8年的彭最后的申明是：庐山会议是毛主席的错误。这是要害。文革有两个史无前例，一个是卷入的群众人数史无前例，小学生亦不例外。受伤害的人群数千万乃至上亿。二是受冲击受审查受迫害的干部史无前例，波及面75%以上，最高层难以幸免，而且首当其冲，阶级斗争斗到无产阶级专政之核心部门，肃反肃到共产党的中枢机关，面积广，人数众，手段残忍，伤亡大，持续时间长……文革是中共建政以来运动施政的集大成……这不能不引起文革后的领导集团对历史、领袖、体制、理论与方法的反思反省，尤其是对领导体制与领袖专断的反思，应该说，四千人大讨论是党内空前的思想解放，其深度与成果远远超出了历史决议。

◇ 之九十二

据龚育之介绍，决议起草时胡乔木主持的起草组曾力排众议，这个众议，就是相当多老干部对毛的个人品质与个人责任的评论。个人崇拜是检讨的首要失误。以前，是对毛的无条件的个人迷信。张执一反省说：“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弩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李维汉历经中共历史的各个阶段并身居高位，对毛较了解，他认为毛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中共建政以来，56年反冒进是关键，陈云讲反冒进是中央集体意见。到58年，毛称“你们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一人推翻中央方针。房维中披露，毛58年批评李富春怀疑钢铁翻番的指标，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毛的一言堂导致大跃进无人进言。因为谁对大跃进有意见，谁就是右倾右派赫鲁晓夫。党内形成了邓小平所讲“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的不正常状况。大饥荒是这种独断的政治的结果。

◇ 之九十三

中共党史体系的编纂人胡乔木说，58年党内开始宣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跃进的进程与对毛的个人迷信相辅相成，同时达到高潮。因为捧毛，胡说，这个同志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了。胡讲的是毛欣赏的柯庆施。南宁会议时，毛把柯氏文章《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给周看，问周：“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周答：“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周曾因反冒进提出辞职，为政治局拒绝。胡认为，59年庐山会议批彭后，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毛夸大阶级斗争作用，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事后检查，从57年到66年主抓的阶级斗争案件都是假的。夏衍说，58年毛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他对毛的评判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张爱萍讲，毛是言必称秦始皇。朱德秘书陈友群说，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胡克实说，毛是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

◇ 之九十四

胡乔木讲，由于58年党内盛行的个人迷信，中央高层“就不太容易平等地跟毛主席讨论问题”。超英赶美的经济跃进，与“不能够容忍更谈不上接受正确意见有关”，毛了解陈云比他懂经济，但把陈当做党内右派。关于文革的根源，胡认为“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如果这样找，不但无法纠正文革错误，反而会坚持这个错误，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李锐伯与慕纯农说，毛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最后孤零零死在深宫里，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胡乔木讲，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是毛的误区，毛对蒙哥马利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因为有了八亿人口，非斗掉它一批才行。胡耀邦讲，过去文件上写“毛主席、党中央”，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老是搞斗争，动辄就叫作党内斗争，再一提叫作路线斗争，再一提叫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方毅说，苏区时毛泽覃与毛争论，毛就打他，他喊“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 之九十五

关于文革教训，坐了6年国民党监狱又在文革中被共产党监禁9年半的彭真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他醒悟到，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邓小平也认为文革的教训是制度问题。邓说，制度因素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文革的另一个教训是个人崇拜。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一定的个人崇拜，大跃进发动不起来，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批判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也很难批起来。胡耀邦说，突出宣传个人是1958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荒谬绝伦。据统计，1967年就刊印《毛泽东选集》9100多万部，等于文革前15年的8倍。《毛主席语录》印了3亿6千9百万册，到69年，毛像章制作了22亿个，人均3枚多……有鉴于此，胡在81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党的六中全会要正式做出决定，要永远严禁搞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82年中共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种规定是史无前例的。

◇ 之九十六

80—81年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历史问题的一个重要共识是，57—58年党内盛行的毛迷信是大饥荒与文革的祸根，与党内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相一致。而高度集权往往导致领袖专断，如邓小平所言，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许多重大问题往往一两个人说了算，党组织成为个人意志的工具。李慎之认为，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 with 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成了极权主义。邓80年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胡乔木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反对……59年庐山会议是毛迷信的一个重要标志。林代彭后，首先在军队范围内搞个人崇拜，以活学活用等方式更多煽起个人崇拜的狂热，毛又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把军内的个人崇拜影响到社会上了，对文革起了准备的作用。六十一人叛徒案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有深刻的反省。薄一波说，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们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刘澜涛说，我们这些人都把毛主席当神供奉，一个劲儿地烧香呀磕头呀，把老人物熏黑了还烧呀，磕呀，我们也有责任呀！安子文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历史也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谁来监督毛主席？这是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高层反思文化大革命最高水准的拷问。

◇ 之九十七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一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问题，二不能回避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与政治体制问题，三不能回避中共建政以后运动施政的问题，四不能回避党内核心领导层的政治分歧与权力斗争问题，五不能回避以阶级为中心的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与阶级歧视的政治迫害问题，六不能回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列宁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革命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与现代化的紧张冲突及二十世界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失误与失败问题，七不能回避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政治文化与人类主流的文化文明的断裂问题，八不能回避卷入文革的从高层到底层各类人群的不同程度的摧残人性践踏文明的个人责任问题。造就文革的是这八种因缘，或主要是这八种因缘。八个不能回避，是全民反思文革成败与否的衡量尺度，也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走向政治成熟与文化自觉的精神标志。正视，而不是回避，更不应遗忘。理解当代中国，一定要研究文革，当代中国起源于文革。文革反思，从我做起，“要争取自由，唯有靠自己”。

◇ 之九十八

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邓小平代表的毛泽东同时代的老资格政治家们对十年文革的认识与裁判。其积极价值是判定文革十年是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邓称是“巨大的浩劫”，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毛泽东对十年内乱负有主要责任。邱会作和江青讲公审林江，就是审判文革审判毛泽东。把毛请下神坛，是这个决议的最大成果。十年造神运动宣告失败。但这份历史决议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却如陈云所说，要一锤定音，确立毛与毛思想的历史地位。因为这种政治需要，使决议有了文革被林、江“反革命集团”利用的错误判断，即“利用论”，以减轻毛的罪责，这是决议的基本局限性。对毛的评价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胡耀邦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和“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也要说透”及四千高级干部讨论中许多尖锐深刻的意见都被舍弃了，从而留下了遗患。毛生前焦虑不安的“秘密报告”因邓陈及黄克诚对毛的辩护而未现，毛与党难舍难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倒不得”，决议的核心问题是

对毛的评价，确立毛的历史地位，这是邓陈的一致意见。可以论定，这份决议还是也只能是一份权宜的政治决议，历史仍要后人评说。

◇ 之九十九

历史是吊诡的、调皮的。记录在官史上的，堂皇、严肃、一本正经。可是，再有政治原则的头脑，怎么会完全遏止心灵的激荡呢？发明“大民主”之术语的李慎之对我讲过，起草历史决草的时候，邓小平曾对胡乔木说，有人坚持要写毛的品质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看有，举两个例，对待高岗与刘少奇，但不能写，写了对党不利。邓小平解释了其政治考虑：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先贤李慎之先生在为王年一、张天荣和我与余习广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辞典》作序中，写道：尽管发动文革的第一原理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实践的结果却是，破不但不能导致“立”，甚至不能达到预期“破”的目的。在精神的领域内，只有以经得起考验的新的道理代替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教条，才能最终完成破与立的过程。换言之，只有新的东西的完全确立，才是旧的东西的彻底否定……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与彻底否定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直到史学和哲学的伟大发展。……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那样流血的智慧。

（全文完）

□ 原载《爱思想》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